

“人”的关怀：从新马早期报章看马华文坛对“五四”之关注

黄佩晶*

苏丹伊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文学程

摘要

马华文学的萌芽与“五四”文坛的关系极为密切。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部分中国人民就因战事、饥荒、经济等问题而陆续迁移至南洋一带。虽身处异乡，但南迁而来的人民时刻关注中国国内与侨居地的动态。他们便透过创办报章以起到“改良社会、提倡新文化、灌输侨民爱国思想”的作用。透过这些报章与副刊，马华文坛对文艺创作所提出的相关主张、文学创作等也得以发表，进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马华文学论述场域。当中，在“五四”时期备受热议的有关“人”的课题亦在马华早期报章上占了一定的分量。因此，本文将尝试透过《新国民日报》与《益群报》这一文学论述场域，探析马华早期文坛对中国“五四”文艺与思潮，尤其是对“人”之关注与人道主义的引介。

关键词：马华文学，“五四”，“人”，人道主义

* 黄佩晶，马来西亚苏丹伊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文学程硕士研究生。

**Human Concern: An Overview on Attention of Mahua Literature
towards May Fourth through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Wong Pei Tjin *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eginning of *Mahua* liter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 During mid-19th century, some of the Chinese 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 (the *Nanyang*) due to war, famine and economic issues. The Chinese immigrants not only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land that they currently stayed but also to their homeland as well. Thus, newspapers had been launched to spread the patriotism among the Chinese immigrants. Newspapers a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society, advocate new culture and instil the feeling of patriotism in the immigrants”. Therefore, the notions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literature works can be published on the newspap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supplementary copy. Among the discussions, ‘human’ which is one of the hottest topics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is also know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 of *Mahua*.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on the attentions given by the *Mahua* literature to the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trends of May Fourth, especially the introduction on “human” and humanism through Sin Kuo Min JitPoh and YikKuan Poh.

Keywords: *Mahua* literature, May Fourth, “human”, humanism

* Wong Pei Tjin, Master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Modern Language,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绪论

“五四”运动乃是以“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两大旗帜为主要宣传口号，并旨在唤醒沉睡中之中国人民的启蒙运动（周策纵，1999）。所谓启蒙，其题中必有之义离不开对“人”之发现，而诚如郁达夫（1935，第5页）所言：““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故此，在这一背景中崛起的“五四”新文学不仅烙上了启蒙的印记，“人”的价值与突出更是这一时期的其中一项识别标志。事实上，“五四”文坛除了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之门以外，马华文学的酝酿与萌芽亦与“五四”文坛难脱关系。¹自19世纪中叶开始，部分中国人民就因战事、饥荒、经济等问题而陆续迁移至南洋一带。虽身处异乡，但南迁而来的人民却仍旧心系自己的宗祖国（崔贵强，1984）。由于关注中国国内与侨居地的动态以及向身居南洋一带的中国人民灌输爱国思想，他们便透过创办报章以起到“改良社会、提倡新文化、灌输侨民爱国思想”（郭惠芬，1999，第73页）的作用。因此透过这些报章与副刊，马华文坛对文艺创作所提出的相关主张、文学创作等也得以发表，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马华文学论述场域。本文将尝试透过《新国民日报》与《益群报》这一文学论述场域，探析马华早期文坛对中国“五四”文艺与思潮，尤其是对“人”之关注与人道主义的引介。

一、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新国民日报》对“五四”之接受与响应

随着“五四”运动影响的深入以及南来作家群的努力，带有新思潮、新用语的文学创作逐步开始呈现于马来亚的读者眼前。在1919年《新国民日报》创刊之时，编者张叔耐就已经以“痴鸠”（1919年10月1日）这一署名发表了“社论”，并于文中介绍了办报宗旨：

诸君要知道共和的中华民国，便是我们的本国。共和国的法律，本是言论自由的，但是我们这共和国，却又不尽然。但凡心口如一，说得太直截了，便有是非招出来。并且如今在南洋，便比不得国内。因为是寄居在别国的土地上。一切动作言论，都要都要依着这居留国法律行事，不能胡乱的……本报现在出版，第一桩，就是这句话了，便是言论尽可自由，而以不背于居留地政府的法律为范围。第二桩，本报的宗旨，是促进共和国的程途，发挥平民政治的意义。要使得我们侨界同胞，人人趋向进化的方向。第三桩，志愿，要改良社会，鼓吹教育，提倡实业，用浅近的文法，纯正的意思引诱吾

¹ 有关马华与“五四”文坛之间的关系，方修、苗秀、杨松年等人在各自的著作中皆有相关论述。方修曾言：“因而真正渊源于五四运动的马华新文学活动，《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出现，实为其发轫”。（方修，1986，第1-2页）另外，苗秀亦对此认为：“《新国民杂志》的诞生，可以说是标志着马华文艺酝酿的时期的起点”（苗秀，1968，第18页）。再者，杨松年则曾提及方修与苗秀对于《新国民杂志》为马华新文学的起点这一说法，并声称这是“一般上为新马文学研究界所接受的”。（杨松年，2000，第11页）

们同胞，使得人人脑筋里印着极大的爱情，这爱情是什么，便是中华民国四个字。（第2版）

藉由以上这段文字，尤其是“要改良社会，鼓吹教育，提倡实业，用浅近的文法，纯正的意思引诱吾们同胞”即已能窥探得知《新国民日报》对社会姿态，尤其是对“五四”的关注与呼应。实际上，这些“改良社会、民众生活与思想意识”的主张，尤其是“用浅近的文法”都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关键词。之后不久，《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的“教育界”栏上连续转载蒋梦麟（1920年3月3日）的〈新文化的怒潮〉，其中就言道：“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为一个光明的世界”（第14版）。另外，连载于同一份刊物的“评论”栏上还有陈独秀的〈中国人精神的堕落〉，他批评了中国人的精神层面比物质层面更为堕落（陈独秀，1920年6月29日）。从1921年2月18日开始连载于《新国民杂志》上的〈新思潮的真相〉则认为在平民主义的趋势下，人民应有享自主的权利与平等的观念（镒民，1921年2月18日）。显然的，“五四”所积极主张的平等、反封、人权等概念确实曾为马华文坛所引介。

实际上，翻开此时期的《新国民杂志》即能看到有关“人”之相关内容占据了该杂志极大的部分。1919年12月12日《新国民日报》“时评”栏就刊载了雁声（1919年12月12日）〈“牺牲”与“奋斗”〉一文，其中更是强调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属性，即为解决人生根本问题：

新思潮最初的发动，虽是受了某项问题的刺激，实在是一种新文化运动。这种新文化运动是学说上的平民主义，是解决人生根本上问题，依着社会革新的思潮澎湃起来的。在这种思潮进行的程度，应该由国民个人自决的性能。在学说上竭力传播关于人生问题的真理和个人或团体的“解放”与“改造”，由小体达到大体，使全国国民觉悟，更进而达到人类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我知道社会上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生的根本问题。我们爱国学生也应该从根本上着想，根本解决，在根本上发放。（第10版）

雁声在此文中强调了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重要性，而解决这些涉及到人生重大问题之前提就是需先让人民对目前所处社会之现况有所觉悟。值得讨论的是，“觉悟”是“五四”运动中的最重要另一关键词。陈独秀（1987[1916]）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就曾阐明人民需在伦理层面上有所觉悟，并认为在伦理上有所觉悟以后，方能惠及政治层面上的表现。雁声（1919年12月12日）在〈“牺牲”与“奋斗”〉中即主张以思想上的觉悟为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基础。显然的，“五四”时期备受热议的“启蒙”、“觉悟”等新颖思潮亦为马华文人作家们所接收，并对此加以鼓吹。

稍后于1920年12月16日开始连载于《新国民杂志》“新思潮”栏上的增愷（新文学目的底商榷）亦针对人生问题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新〉一文明确地表示了使用新文学进行创作之目的：

新文学，新文学！就止文言变成白话了事吗？不是！人家都洽新文学，我们跟着凑热闹吗？也不是！……，新文学底真意，乃是平民文学，不是贵族文学，是普通文学，不是部落文学，是写实文学，不是虚伪文学，是创造文学，不是因袭文学。新文学底价值在此！……所谓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并不是指[这]种文学专给贵族看，或专给平民看，也不是专讲贵族生活，或专讲平民生活，更不是平民自己做的文学，或贵族自己做文学，乃由精神上普通与否，真的挚与否，而为别。（增恺，1920年12月22日，第14版）

文中所提到的“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其实与陈独秀于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论〉论述相一致。在〈文〉中，陈独秀（1997[1917]）主张欲发起新文学，必须“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第20页）。显然，藉着对新文学的介绍，增恺似乎已经在强烈地呼应“五四”新文学与平民、人生之间的紧密联系。增恺于文中建议读者可参阅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增恺，1921年1月6日），而众所周知，〈人的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创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周在〈人的文学〉中勾勒出创作时应当遵循的精神，并认为应以人的生活为创作主轴（1997[1918]）。文中，周以易卜生、托尔斯泰、莫泊三、哈代等人的小说为例，说明了这些小说家虽以平凡人为小说主角，但却能够从中呈现出爱心与人道主义关怀（夏志清，2001）。简言之，〈人的文学〉主张“颂扬人性，以人道主义为本”（王德威，2013，第470页）的创作精神。

虽然〈人的文学〉并未被转载于《新国民杂志》上，但被上述引文中所极力推荐，显然曾为马华早期作家所关注，也应当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当中有“人的文学”的思考可能冲击并牵引着此时期的作家群，以至出现了为数不少以“人生”为创作主旨的作品。另外，更值得指出的是，增恺〈新文学目的底商榷〉与周作人原载1919年1月《每周评论》上的〈平民的文学〉中所谈到的内容极为相似，或更明确的说〈平〉中的观点大抵为增恺挪移到〈新文学目的底商榷〉中。由此可见，马华早期文坛的崛起，尤其是对于文学创作方向的确立，确是难脱“五四”思潮之影响，而在这其中周作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一反传统式小说中以才子佳人、英雄豪杰为重心的创作题材，反而提出应该写“世间普通的男女之离合成败”（周作人，2009[1919]，页103）之事，他同时倡导文学应该是“人性”的，是人类的，是属各人的，而非“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周作人，2009[1920]，第207页）。周于文中所提到的内容皆符合了“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个人与个性解放的呼声，且成为“五四”作家群们创作的指标。

1922年10月18日，《新国民杂志》“评论”栏开始连载了林独步编述的〈新文学概论〉。林氏（1922年10月27日）于文中提到：“因为文学是要表现人生之几微真相，所以不得不以知识为内容；知识是文学内容之一”（第14版）。另外，林氏（1922年11月7日）更提到短篇小说占了此时期文学区域的最大比例，原因之一不外乎是这类小说“最会把人生一种极小局部的真相详细描述，而暗示读者推想人生全体情趣”（第14版）。又言：“况且近代最流行之写

现实主义文艺，常把不快感的人生悲惨黑暗方面，写出来，令人感了一种深刻的印象美感”（林独步，1922年11月17日，第14页）。较后，他又进一步地补充道：

文学之目的，若简言之：是在表现人生的真相，而给人以实生活以外一种文化的美感幸福。所以描写人生真相之文学，不能离掉现实的“真”，同时于“真”的现实以外，向上求其绝对无限美感的“美”的理想，给读者一面看文艺中所写之事实，一面揣想书中所未写的人生未经说的其余部分——于书中所写人生真相中暗示未写人生的全体。不消说的，人生的全体是无限，固然不能明瞭捉着，但是我们一面赏识文艺，一面冷静自己冥想，可以直觉的，心会的，感受一种自悟的真理，心中当然说着：“是了！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了！”一掩书，把自己一生所经验之复杂事物，回顾之，沉思之，关照之，就是觉了一种微妙的人生情趣。（林独步，1922年11月21日，第14版）

显然的，林氏已经明白地指出了文学与人生的密切关系。

综合以上所谈，这些文学史料皆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当时马华文坛热衷于提倡：文学创作需向人生迈进，小说创作乃为表现人的生活为主的，而这与正在中国本土进行中的“五四”文学思潮是具有共时性的。透过中国方面所散播的新思潮与创作要领，“人”的重要性以及新文学与人生的内在联系不仅已为此时期的马华作家所领悟，这种思想冲击丰富了马华知识阶层的视野，并对之后的文学创作应当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二、“五四”问题小说：《益群报》与《新国民杂志》的推介与转载

当“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益群报》的编辑亦积极、主动地响应新文学的号召，自觉地学习随着“五四”而来的文学与文化革命（郭惠芬，2001）。1919年8月16日，原载于《新潮》第1卷第5号的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开始连载于《益群报》，以向读者介绍德谟克拉（democracy）、平民、民主等新颖的概念。1921年9月3日开始连载的朱隐青〈德谟克拉西之三大要素〉一文亦呈现了马华文坛对“五四”运动积极响应的态度。1919年8月29日，原载于《新潮》第1卷第4号的汪敬熙（1919年8月29日）〈什么是思想〉中亦谈到若需彻底改掉封建的国民性，就该有此行动：

第一，须知思想的本质；第二，须知道中国人思想的习惯有什么不良之处；第三，须知道这些坏习惯从何而来；第四，须知道这些坏习惯受何种社会制度之影响，及他的对于社会制度的影响；第五，知道以上所讲的四项事之后，才能开脉案，定药方。（第7版）

在汪敬熙看来，唯有清楚地认识了人类思想意识上的败坏根源以后，方能更为有效地开出“药方”，思想革命方能更为有效。在此即得以窥探出当时的知识分子

们对于传播新思潮的积极态度，而这种热衷于新思潮的态度更是直接影响了报刊在选刊小说时的准则（李志，2001）。事实上，《益群报》主编陈壁禅在1919年8月15日的“新小说”栏上就刊出了杨振声的问题小说《一个兵的家》²。杨振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后来成为教育家。同年8月16日，编辑“活”（1919年8月16日）也在“编者剩话”中宣称发起“新小说会”（小说栏目）的目的与条件：

记者现在想发起一个新小说会，做大家消闲的果子。吾且把这会的条例，胡乱写出来，诸君若是赞成，就请把大稿寄来。

- 一、主义是写实派。最受欢迎是写南洋社会的。但黑幕材料不要。
- 二、体裁是白话体，文言不要。
- 三、每篇最长不得过千五百字。
- 四、来稿需誊写清楚，句读分明。
- 五、满百篇后，即由本社印成单行本发行。投稿一篇，赠书一本。
- 六、这种小说的样子，如本报新登的《一个兵的家》。
- 七、投稿者封面需书名，本报编辑部新小说会活收。
- 八、来稿不论登与不登，概不寄还。
- 九、违背以上各条例，概从割爱。
- 十、各稿陆续登出，以收到先后为次。（第7版）

这篇“新小说会”的发刊宣言正式宣告了他们对创作的态度与标准，也阐明了“新小说会”的创作理念与原则，从而指导了欲投稿的小说家所应遵循的创作指示。而从第六项宣告中，就己能看出早期的马华文坛对“五四”文学作品的重视与借鉴。编者选择《一个兵的家》的用意己无从考证，但此问题小说以浅易的白话，现实地道出了军阀混乱为社会所带来的困苦，确实提出了值得令人深思的军阀罪恶与社会底下阶层问题（杨振声，1919年8月15日）。

除《一个兵的家》以外，中国作家叶绍钧《春游》、汪敬熙《谁使为之》亦先后于1919年8月23日及同年8月28日转载于“新小说”栏上。《春游》乃一篇透过自然界的力量而使一名依附于丈夫，认为丈夫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的妻子霍然觉醒，认为应以自身为本位，并从封建思想的钳制下挣脱的作品（叶绍钧，1919年8月23日）。汪敬熙（1919年8月28日）《谁使为之》则描写了一位受家人摆布而投身于官场之男子的悲哀遭遇。这些小说或是揭露了军阀混乱所引发的社会底下阶层问题，或是呼吁并关注女性应有的生活权利，或是控诉了封建家庭制度的罪恶。显然的，《益群报》所刊载的作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莫大的联系，尤其在“文字形式和内容主题”上更是与中国当时所盛行的几乎趋向一致（徐艰奋，1999）。这些曾经出现在“五四”重要刊物《新潮》杂志上的问题小说陆续被《益群报》转载，其中更成为马华早期小说家在创作时所需遵循的规范。

此外，原载于1920年1月《新青年》上的夬庵《一个贞烈的女孩子》，在同年10月5日亦开始连载于《新国民杂志》“小说”栏上。夬庵《一个贞烈的女子》³讲述了女子被迫随夫死去的情形。小说中年仅十四岁的苦人儿阿庆因未婚夫逝世而被父亲活活饿死。这全因为身为举人的父亲认为随着未婚夫死去，不“苟活”于世，方能获得县太爷颁的贞洁牌匾。对于身为父亲的林举人而言，绝粒殉节不仅是一件难能可贵之事，更是能受到他人敬重的举动。夬庵深刻地刻画了当时社会藐视女子地位、剥夺女子存活之权利的种种罪恶。显然的，马华早期文坛对中国文坛的借鉴除了表现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上以外，探讨人生诸问题并具含写实意义的问题小说亦为马华文坛所接受的。

透过以上所提及的文学作品的转载，即能窥探得出马华早期文坛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倾向。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宣扬乃“五四”所极力主张的其中内在精神。无论是《一个兵的家》、《谁使为之》还是《一个贞烈的女子》，这些小说皆鲜明地闪烁着“人”的色彩，透过当中所蕴含的“人”的价值之讨论而促使其成为马华文坛初创时期的一个识别徽章。

三、“人”的突出：以“人”为本位的创作倾向

在文学这一版图上，犹如上述，马华文坛除了在理论建设方面积极地响应“五四”的新文学革命，尤其是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这种以“人为本位”，以社会的缩影为创作材料的呼声以外，在新文学的创作方面亦鲜明的反映了个人解放、思想解放、人人平等的信息。李开中（1921年8月15日）在〈文学家的责任〉中就强调：

文学是要表现环境、改造环境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应当提倡的是感情的冲动的文学，不是理性的玄邃的文学，是血与泪的文学，不是花与口的文学，是灰色的惨淡的外国文学，不是贵族的雍容尔福的英美文学。（第14版）

在这种誓要改良社会环境，以“灰色惨淡的”生活为题材的基础上，唯有将长期受社会压迫，无自由意志的一群人作为材料，置入创作中，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与讨论，而这也是作家的责任。

1924年11月22日，《新国民日报》的《戏剧世界》编者齐民亦曾言：

³ 夬庵的小说《一个贞烈的女孩子》发表于1920年1月的《新青年》7卷2号。同年10月5日开始连载于《新国民杂志》“小说”栏上。然而，载于《新青年》与《新国民杂志》上的小说题目却稍有差异。当该小说转载于《新国民日报》时却少了“孩”字，成了《一个贞烈的女子》。再者，故事中部分人物之名字亦有所不同。例如：“王举人”（《新青年》）为“林举人”（《新国民杂志》）；“阿毛”（《新青年》）为“阿庆”（《新国民杂志》）；“吴家”（《新青年》）为“英家”（《新国民杂志》）。发生这种情形的原因不详。

我们站在社会里，无昼无夜，无时无刻，都被虚伪的恶空气包围着，弄得人们大多数鸠形菜色，要死不能，要活不得！可是要把这恶空气冲破，除非多产纯洁的出版物，测赤裸裸地逐件来描写，使人们触目惊心，叫他们对穷凶极恶的事，不敢尝试，那才有挽救的地步。……出版物中有转移社会能力的，厥为戏剧。戏剧概分为二种，一是歌剧，一是话剧。歌剧短表情，远事实，演来流于板泄。话剧事实表情，均能体贴入微，演来流于活泼。所以历史上令人崇拜的歌剧大家莎士比亚，反不敌后来居上的一个话剧创造者易卜生。……我们创刊戏剧世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虽然大家的作品，比不上易卜生，但是时常赤裸裸地把社会虚伪写出来，指导人们进光明之路去，未必无影响社会现象。（引自杨松年，1986，第47页）

齐民的一番宣告显然已清楚地表示出戏剧创作与“人”之密切关系，即表现出社会上有违人性发展的黑暗处，以照亮人们眼前的路，引他们走出黑暗之地。1922年10月6日开始连载的华桂响（1922年10月7日）〈论戏曲与社会改良〉亦说道：“戏曲所表现人生真相者也，戏曲为文学之一。故以表现摠省，惟与小说及其他种文学所不同者，则戏曲乃以动作而表现人生之真相也”（第14版）。由此，马华文坛亦曾出现1925年1月12日的新晓《买婚书》这类在“婚姻、遗产、育婴等问题上反映了初步社会主义思想”（方修，1986，第27页）的问题剧。

因此，在“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下，关注并接受“五四”思潮与“五四”文学的马华文坛亦在这一方面上有所表现。一涵（1919年11月29日）〈怎样才算是过人的生活〉里就针对人力车夫、妓女以及那些封建迷信之人为例，列明了为人应有的生活方式。

列位，你们在北京看那街上可怜的人力车夫，把身子当作马牛，替人家走路，一天跑到晚，身上的汗犹如下雨一般，饿了吃一块粗面包。渴了就在路边——把着瓢——取冷水吃。他们吃的水，不就是那马车大车的驴马吃的水吗。（第14版）

稍后，雪野子农的新诗（1920年5月4日）《雨里的人力车》更是透过作品对人力车夫在工作上所承受的风险表示了同情：

声隆隆的雷
细霏霏的雨
被风风雨雨的人力车
同着光闪闪的电
出没爆列真是令人寒慄的东西
怎么他们也不怕呢
啊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就是因为几角银的纸币（第14版）

如同胡适于《新青年》所发表的白话新诗《人力车夫》⁴对人力车夫的际遇充满同情（胡适，2009[1918]），《新国民杂志》上刊载的马华问题小说如：WY（1925年5月25日）《人力车夫》、中美（1922年2月17日）《残冬》、梧（1923年5月28日）《泣声》等亦以人力车夫的生活与工作景象为题材，从而表现了社会底下阶层所承受着的肉体与精神上的苦楚。人道主义精神可被视为启蒙主义的一大支柱。“五四”启蒙意识浓厚时期，“人”成了衡量行为规范、道德标准的重要指标。胡适（1998[1919]）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就曾表明了其对人力车夫这一课题的高度关注。事实上，人力车夫可被视为是“五四”作家的其中一项重要题材。在作者的生活圈子中，人力车夫这一最为贴近他们生活的劳动形象理所当然地进入到作家的眼帘，成为他们藉以寄托人道主义关怀的载体（夏晓红，1989）。

另外，尾随晚清对女子的关注，“五四”时期更是热议有关女子为“人”的一个时期。事实上，为能更集中、系统地讨论涉及女子社会地位、权益等问题，《新青年》在1917年2月份时即开辟了“女子问题”一栏（余英时，1996）。马华早期小说亦以女子在当时社会上所面对的问题为其中的创作材料。苗秀（1968）曾针对《新国民日报》的小说做过如此评论：

内容方面，这一时期的小说大都是纠缠于两性关系之间，如曝露旧式买卖婚姻的痛苦，恋爱不自由等等。其次是表现在封建社会中的妇女如何被压迫，以及她们的种种悲惨的遭遇。此外偶然也有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如穷人的苦难，……。自然，所曝露，所揭发的，还是极浮面的，好不深刻。不过，这恰正符合当时‘五四’的新思想思潮——一开始，马华小说作者就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的立场，以文艺作为武器的抨击旧礼教旧伦常，要求婚姻自由，提倡妇女解放，以及揭露社会上一些不平等的现象。（第12-13页）

当中，1919年12月12日第一篇刊载于《新国民杂志》上的问题小说——《两条活活的生命》就针对封建制度与思想下对女性所造成的悲剧进行了创作（灵芬，1919年12月12日）。该作品以上海浦东市某个村庄为背景，刘、王这两个当地的绅士家庭因儿女成亲而结为亲家。当时，正逢流行瘟疫虎列拉（cholera）盛行之时，而刚新婚的王五星儿子——王椿初更因而染上疫病。遗憾的是，王五星并未及时招来医生治疗椿初，反而以道士画过符的“神水”喂其饮之，最终致使椿初病亡。父亲愚昧、守旧、迷信的行为已深深地害了一条宝贵的生命。然而，这令人感叹的故事并未随椿初的逝世而结束。当椿初的新婚妻子闻此噩耗时即悲伤不已。但是父亲不仅未加以安慰，反而以姑母作为例子，诱导女儿自缢。

⁴ 《人力车夫》，原载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全文如下：“车子！车子！”车来如飞。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客问车夫：“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能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中惨凄。”车夫答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你也自然比别人更要伤心，我替你想想，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又没有一男半女，我们是什么人家，再醮的事万不能打主意，你自己应当打算。”说到这里停了半晌。等了好久，才听到的说。“此前我们的姑母，他也是嫁了不上一年，伊的男人就死了。伊想想左右无靠，伊就自缢了。然后还得了朝廷的旌奖。满村里都称赞伊是节烈之妇。说我们真是礼仪之家。才有这样的女儿来荣耀祖宗。……”说到这里，正齐[笔者按：正齐为女儿父亲]还想说下去。他的老婆抢着说。“那情形不同。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贫苦的。不能养伊。所以伊只得一死。现在我们还养不下一个女儿吗？椿初虽然死了，我的女儿不可在我们家里过活吗？”正齐连忙厉声说道：“我们是不能养的。”那时椿初的老婆听到父亲这样的话不由得心里一酸，眼泪直流下来。正是外面有客来了他们又起身出去。正齐回头对他的女儿说：“你自己打算罢。”转身就往外出去外。（灵芬，1919年12月19日，第14版）

父亲这毫无怜悯与慈爱之心的言论更是将女儿推下深渊的主要因素。第二天早上，当椿初的妻子被发现时已在床后自缢身亡了。听到女儿（媳妇）消香玉陨的消息后，刘正齐与王五星二人非但无任何的伤感之情，反而认为是虽死犹荣，值得高兴，而且是因为家教极佳的关系，方能使王家出了个烈妇。随后还欢欢喜喜地打发了个人去报官以获旌奖，并认为“这不但是死者的荣耀，还是两家人的光辉呢”（灵芬，1919年12月20日，第14版）。除了针对封建社会对女性所带来的伤害以外，1919年12月23日《新国民杂志》连载的双双（2000[1919]）《洞房的新感想》则以两位朋友——鹤朋与石声在参加婚宴时的谈话内容为主轴，道出了在封建婚姻制度与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下所酿成的家庭悲剧。鹤朋接受家人的安排而娶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妻子为妻，但又因社会上封建闭塞的风气而令到他无法轻易作出离婚的决定。鹤朋道：

你的话何尝不是[笔者按：石声劝鹤朋暂且打消离婚之念头，并专注于事业上]，但我总觉得做人毫无乐趣似的，将来倘能在社会上做点事业，把我爱情发泄到事业上去，或者可以得点乐趣，也未可知。至于离婚念头，我是早已打断的了。去年我为这椿事，同周静普[笔者按：鹤朋之友]商量，他说：“现在社会的风气这样闭塞，慢说父母亲族不许提这离婚二字；即提出去，那不相干的路人，不问青红皂白，先要痛骂一顿。法庭里准不准还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准了，你也应替女的一方面想一想才对啊！社会上一般人对于寡妇再嫁，还说她没廉耻——那男人再娶，还三妻四妾的，都还说是应该，此等事虽没有丝毫公理，但现在的女人那里逃得出这恶习惯的圈子呢？离了婚的女子是更不必说了，男的再娶，女的便要守一世的活寡——我们做男子的心已不安，万一女的寻了死，那时男的心上觉得怎么样？我听静普的话很有理，所以我这理想的室家之乐——算是绝望了！（双双，2000[1919]），第4页）

后又言道：

我以后的大愿，便是打破社会的恶习惯，什么‘男尊女卑’啦；‘女子无才便是德’啦‘婚姻听诸父母’啦；此等说话，还有一点儿理性么？但我此刻既不能离婚，又不肯另娶，要是为人道主义，勉强去做夫妻，我又装不出这虚伪的爱情，要是说独身主义，我却明明有了妻子，你看我成什么一个人呢？（双双，2000[1919]），第4页）

鹤朋的心情剖白已直接明了地向读者控诉旧社会的思想与行为大大束缚了青年男女的自由与权利。

再者，马华小说亦透过社会底下阶层的贫困生活带出“人”所应享有的自由与权利。厚禄（1920年11月3日）《年初一底乞儿》透过写一群乞丐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带出了人权、自由于每个个体之重要性。新年初一的午后，一群乞丐行到牛车水庙仔街时看到人力车夫奋力地拉着车。车夫“额上底汗点，大雨似底滴下，吁吁底喘，断续底可怜，叱喝声音，哑哑好像个老鸦”（厚禄，1920年11月3日，第14版）。看到如斯情景的众乞丐不禁叹道：“唯我是个乞儿，所以不能役人，也不被人所役，我乞儿虽是衣衫褴褛不像人，恐怕他们人力车夫底生涯，倒没有我们乞儿这样底逍遥自在哩？”（厚禄，1920年11月3日，第14版）。作者透过自行乞讨与以劳力工作者二者之间的一个对比昭然揭示了自由、自主之重要性。

澄觉《马觉》写了一名建筑工人黄福因经济拮据，生活潦倒而向一位他日前为其日夜赶工盖好房子的财主求助，但却不果。黄福在回程中路经养马厂并看到马夫正在喂马。饥饿的黄福请求马夫施舍他一些吃的但却不得要领，只因马夫认为：

你这人敢是傻子么，你难道不懂得我们为什么给许多东西那些马吃吗？他们没有东西吃就没有力，我们要求他们的力，所以不得不给东西与他们吃，他们吃了我们的东西，生出力来偿还与我们，我们用他的力来赚钱，不特没有损失，还可以赚多少利钱，他们实在毫无得益，只是活在世上，终生替人家劳碌罢了，若果临到老了，没有气力的时候，把他卖与屠户，还可以得回一笔钱。你垂涎这些东西做甚？这不是好吃的，我们又没有求你的力，那里有东西给你吃，休要妄想罢。（澄觉，1921年6月29日，第14版）

马夫的一番话让黄福领悟了身为出卖劳力一方的可悲处境。稍后更与来邀他一同去工作的朋友鸟成展开了一段甚含哲理性的谈话：

黄福说道：“我方才看见马厂喂马的情形和马夫的说话，不觉发生了一种感想，觉得我们天天替人家劳碌，和那马儿无异，那财主们把工钱给我们，就像马厂主人拿东西喂马一般，我们得了他的工钱养活自己来替他们做工，即如那马儿吃了主人的东西活着来替他驰飙，每天做工自朝到暮，所得的不过两餐，所得两餐，不过要养活自己，养活自己，不过是替人做工，结果于自己实在无利可得，试问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现在决意不干了。”鸟

成说道：“你虽然是这么说，但我们不替人家做工就没饭吃，没饭吃就要饿死了。”黄福说道：“你又来了，比方没有人养马以前，难道那马儿就不能活着吗？我看那马儿没被抓回来的时候，他的生活更快乐呢。”鸟成说道：

“你的说话，纵于偏于理论，却没有顾及实情怎样，那马儿没被人抓获以前，当然可以活着，但是即被人抓回来饲养之后，那马儿就不得不依靠人家养活他。比方现在被人饲养的马儿，他一日跑了出来，那一处的东西容他吃？世上怎容他乱跑，可见我们从前替人做工时虽然可以活着，但是已经进了替人做工的路。若果不干，试问那一处的东西容我们吃。那一处的房子容我们住？即如你老六[笔者按：指黄福]现在没有工做，就饿到这个田地，除替人家做工以外，有什么方法养活自己？”（澄觉，1921年8月22日，第14版）

最终，黄福更发出了他对这个社会的控诉：

“恨天公为什么这样不平等，有些人终生靠给人做工才能活着，有些人什么工也不做，居然快快活活过着。唉！天公啊，你为什么开了这个例，把一部分人活活埋在里面呢。老成！我们想跳出这个圈套，非把这个例□□不可了，但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他呢？我看非大串联合起，互相帮助不可。老成！你不要笑我胡思乱想，你们执迷不悟，这才是木匠担枷呢！”（澄觉，1921年8月23日，第14版）

透过以上所谈及的作品，文中所显露的新思潮，尤其是“为人生”、“个人解放”、“人”的价值与地位等信息是不容忽视的。在“五四”时期里，作家们对人性的关怀、认识与解放，即成就了“五四”以及马华新文学的识别特征。可以这么说，此时的“五四”与马华文学创作，身兼启蒙与教化的重任，以人道主义的目光重新评估了旧社会制度为“人”所带来的残害。

结语

综上所述，“五四”的到来乃是中国文坛上的一大巨变，而这一变化更是对远在南洋的马华文坛发挥了不小的影响。马华早期报章与副刊无论是对“五四”作品的转载、文学主张的宣扬或是马华小说家自身的创作都鲜明地闪烁着“人”的光芒。显然的，“人”不仅成为中国“五四”作家反对封建、守旧传统的辩护理由，它更成为马华凝视“五四”文坛的一个有力证据，一种以“人”为创作基调之内在联系。其实，马华作家透过文学作品于思想意识上对中国方面的接收与继承是有迹可循的。早在1919年8月，《益群报》所转载的问题小说就已经明显地留下了中、马这两者之间传承关系之重要证明。此时期的作家群与所创作的小说不仅具有鲜明的启蒙意识、反封建的决心，亦对社会上的实际情况表现了一定的关心与迫切改良社会的愿景，作品中所闪烁着的有关“人”之价值与信息显而易见。

参考文献

- 陈独秀（1920年6月29-30日）。〈中国人精神的堕落〉。《评论·新国民杂志》，14。
- 陈独秀（1987[1916]）。〈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第37-41页）。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
- 陈独秀（1997[1917]）。〈文学革命论〉。收于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1917-1927）》（第19-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澄觉（1921年6月25日，6月27日-7月1日，8月20，22-23日）。〈马觉〉。《小说·新国民杂志》，14。
- 痴鸪（1919年10月1-4，6日）。〈例言〉。《社论·新国民日报》，第2版。
- 崔贵强（1984）。〈华人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组织〉。收于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第51-66页）。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同学会联合总会。
- 方修（1986）。《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 夬庵（1920年10月5-9，12日）。〈一个贞烈的女子〉。《小说·新国民杂志》，14。
- 郭惠芬（1999）。《中国南来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郭惠芬（2001）。〈脱茧而出的新蝶：1919年至1924年《益群报》的新诗析论〉。收于《回首八十载，走向新世纪——九九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0-44页）。吉隆坡：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
- 厚禄（1920年11月3-4，6日，8日）。〈年初一底乞儿〉。《小说·新国民杂志》，14。
- 胡适（1998[1919]）。〈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收于耿云志编，《胡适论争集·第二卷》（第964-9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适（2009[1918]）。〈人力车夫〉。收于林文慧选辑，《胡适散文诗歌选》（第282-283页）。台北：国家出版社。
- 华桂响（1922年10月6-7，9-12日）。〈论戏曲与社会改良〉。《评论·新国民杂志》，14。
- 活（1919年8月16日）。《编者剩话·益群报》，第7版。
- 蒋梦麟（1920年3月1-3日）。〈新文化的怒潮〉。《教育界·新国民杂志》，14。
- 李志（2001）。《漂泊的家园——新马战前马华小说研究（1919-1924）》。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 林独步（1922年10月18-21，23-28，30-31日，11月1-10，13-18，20-25日）。〈新文学概论〉。《评论·新国民杂志》，14。
- 李开中（1921年8月12-13日，8月15-19日）。〈文学家的责任〉。《文学业谈·新国民杂志》，14。
- 灵芬（1919年12月12-13，15-16，18-20日）。〈两条活活的生命〉。《小说·新国民杂志》，14。
- 周策纵（1999）。《五四运动史》。（陆永明等，译）。湖南：岳麓书社。

- 苗秀(1968)。《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
- 双双(2000[1919年12月23-26日])。〈洞房的新感想〉。收于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香港:香港世界出版社、吉隆坡:马来西亚大众书局、新加坡:新加坡大众书局。
- 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载1919年8月16日《自由神·益群报》,第7版。
- WY(1925年5月25日)。〈人力车夫〉。《说业·新国民杂志》,14。
- 王德威(2013)。〈1941-1937年的中国文学〉。收于[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刘倩等,译)。(第462-6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汪敬熙(1919年8月28-29日)。〈谁使为之〉。《新小说·益群报》,7。
- 汪敬熙(1919年8月29日)。〈什么是思想〉。《新思潮·益群报》,7。
- 梧(1923年5月28日)。〈泣声〉。《说业·新国民杂志》,第14版。
- 夏晓虹(1989)。〈一喜一悲人力车〉,《读书》,9,142-146。
- 夏志清(2001)。《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民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徐浪奋(1999)。〈《益群报》副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回应〉。收于江泓辉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第34-47页)。雪兰莪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 雪野子农(1920年5月4日)。〈雨里的人力车〉。《新国民杂志》“诗词界”栏,14。
- 雁声(1919年12月12日)。〈“牺牲”与“奋斗”〉。《时评·新国民日报》,第10版。
- 杨松年。(1986)。《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甲集)》。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
- 杨松年(2000)。《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BPL(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 杨振声(1919年8月15-16日)。〈一个兵的家〉。《新小说·益群报》,7。
- 叶绍钧(1919年8月23,25-26日)。〈春游〉。《新小说·益群报》,第7版。
- 一涵(1919年11月29日,12月1日)。〈怎样才算是过人的生活〉。《新生活·新国民杂志》,14。
- 镒民(1921年2月18-19,22-28日,3月1-4日)。〈新思潮的真相〉。《新思潮·新国民杂志》,14。
- 郁达夫(1935)。〈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1-19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 余英时(1996)。《现代儒学论》。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 周恺(1920年12月16-18,20-24,27-29日,1921年1月6-7日)。〈新文学目的底商榷〉。《新思潮·新国民杂志》,14。
- 周作人(1997[1918])。〈人的文学〉,收于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1917-1927)》(第60-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周作人（2009[1919]）。〈平民的文学〉。收于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 2（1918-1922）》（第 102-105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周作人（2009[1920]）。〈新文学的要求〉，收于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 2（1918-1922）》（第 206-201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美（1922 年 2 月 17-18, 20-21 日）。〈残冬〉。《小说·新国民杂志》，14。
- 朱隐青（1921 年 9 月 3, 5-10, 12-15 日）。〈德谟克拉西之三大要素〉。《评论·新国民杂志》，14。